

中国隐士

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

STATUS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RECLUSE IN CHINA

中国隐士

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

胡翼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隐士：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 / 胡翼鹏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097-2887-1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社会结构-研究-中
国-古代 IV. ①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0339 号

中国隐士

——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

著 者 / 胡翼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童根兴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刘玉清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7.25

版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 / 274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887-1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隐士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人群，在中国文明史中，历代都不乏其人。隐士们归隐的原因、行为方式、思想与价值取向也有诸多差异，但他们却大都能得到社会其他阶层的普遍关注或尊重。当人们谈及伯夷、叔齐、钟子期、介之推、竹林七贤、陶渊明等隐士时，总会怀有尊重或者仰慕之情。历代文学作品中的隐士，也多被描写得高深莫测，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三国演义》中的司马徽即是其中一例。有的先隐而后出仕；有的先出仕而后隐；有的一生隐居，却偶尔露峥嵘。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是“士”，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个亚群体；他们是生活在体制之外的、与其所处时代的官方的或者说主流的价值体系不能苟合的一些“士人”；他们必须有一些情境下显示出超人的才能，才可能被尊为隐士，没有哪个隐士是一生隐居山林，从未曾展示过其超人才能的。隐士的思想及社会价值取向，对于社会主导性价值观而言，当属“另类”。而恰恰是这些另类的社会思想与社会价值取向，对保持一个社会的价值多样性产生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后世之思想文化的宝贵遗产之一。所以，对隐士思想、行为及其社会功能的研究，是颇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关注，中国隐士也成为不少学者的研究对象。有的学者关注隐士的类型划分，有的学者研究隐士的人格心态，有的学者探讨隐士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有的学者考辨隐士与文艺创作的关系。但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忽略了以下基本前提：其一，他们所圈定的那些作为研究对象的隐士，其身份的社会合法性在哪里？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复杂且多变，隐士的社会身份是从哪个人生时段开始的？又

是如何获得这种身份的？其二，对于一个人是否符合隐士身份，事实上人们的判断存在不同意见，甚至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人物在不同的史传中身份归属不同，这种分歧如何解释呢？其三，有的人努力实践隐士的角色规范，也竭力向世人表明自己就是隐士，但为什么并不能被社会认可？其四，有的隐士传记记载的隐士形象，本身是退休的高级官员，我们如何理解史家这种处理隐士身份的方式？

以上问题的核心是，一个被后人认同的隐士经过什么样的建构机制和过程而获得隐士身份。胡翼鹏的《中国隐士——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一书就是对该问题的深入发掘。作者运用知识考古学和文本解释学的理论视角，将不同时代有关隐士传记的文本记录，看做一个有着内在关联的系统；进而分析各种隐士传记的文本，是如何塑造不同隐士形象的，分析不同时代隐士形象所承载的价值内涵，以及隐士个人的人生态度；再将这些不同时代的隐士形象、价值观点、人生态度等看做一个连续统，以此考察隐士形象的流变态势，从中归纳出历代史家塑造隐士形象所遵循的恒定因素，如隐士坚持不仕，通过逃遁、托病等拒绝与官贵接触，以不入城市、山衣野服与纵情饮酒等塑造自我。这些恒定因素是构成隐士身份的基础内容，也是不同时期的人们认可隐士的共同内容。

由此，根据这些恒定因素可以勾勒出隐士的一般形象，也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隐士表现自我、塑造身份的基本方式，以及社会接受隐士、礼赞隐士所暗含的心理诉求。通过揭示隐士身份确立的过程和机制，可以把握隐士自身行动表现的价值取向和人生准则，也可以了解士人、官员和帝王等其他社会群体通过隐士这个媒介，表达的价值内涵与人生态度；并由隐士与其他社会群体的互动关系，总结出隐士的社会功能，即，隐逸作为一种人生选择，它对隐士本身及其他群体的人生有哪些启发和借鉴作用，进而隐士作为一个社会类属，对整个社会结构系统的秩序与运转有哪些保障或促进的功能作用。

《中国隐士——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一书从理论上澄清了隐士的身份建构机制，也从发掘隐士身份建构机制的过程中有效呈现出隐士具备的社会功能。我认为，作者在本书中，从社会学及社会思想研究的视角对中国隐士这一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的探讨，至少在如下几方面具有理论创

新性。

第一，作者指出，隐士的身份建构是个人行动与社会认同双重作用的结果。

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无所谓隐与不隐，只有当这个被关注的个人进入社会话语的视野，成为被社会多个阶级或阶层的人打量的对象时，他才成为隐士的“候选人”；如果其行动表现与观测者操持的隐士标准相符，那么这个人就成了“隐士”。因此，从广阔的历史时空来看，隐士身份的确立主要由两个方面决定：一方面是个人行动，即个人依据隐士原型的示范，以及个人对隐士角色规范的理解，进行的一系列标识隐士身份的角色实践；另一方面，社会对其人角色实践的认同，并采取特定的制度或认同方式予以认证。经过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一个人的隐士身份才能最终确立，在其生前被社会承认，在其身后被后人接受。

第二，作者指出，隐士身份的特质是其作为抽象的价值符号。

隐士既是隐居不仕之人，游离于政治权力体系之外；又是拥有知识与道艺的优秀分子，凡是被视为隐士的人，普遍学识渊博，是知识的拥有者。隐士既身体力行世俗社会的道德规范，诸如安贫乐道、宽容礼让、淡泊名利等，是道德理想的实践者；又栖身林泉、优游山水，是悠闲雅致生活的象征，是卓尔不群的内在标识。而且隐士或者傲视王侯，或者轻贱财富，或者励志保节，或者远祸全身，所以隐士在被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逐渐抽象化为一种理想的价值符号。当一个人被确认为隐士时，社会认同机制关注的是其人不属于官僚体系的那一段人生轨迹，而且这一人生轨迹被不断放大，成为其一生的身份符号。

第三，作者指出，隐士及其隐逸行动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

其他社会群体认同隐士，实际上是各自内在需求的外在投射。士人之隐遁，曲折含蓄地表达了怨怼的情绪，以一种较为平缓的方式宣泄对君主和政府的不满，以个人的行动间接暗示“邦无道”。官员一方面将隐逸作为宣泄的方式，也以此明哲保身，甚至借助隐士的社会声望，来提升自己的道德名声。而帝王通过优待隐士，表明帝王本人怀德体道，是英明君主。所以，隐士以德修身、以礼化俗，对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维护社会秩序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世人对隐士的接纳与认同，也就使得隐士具有了

中国隐士——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

独特的道德整合功能。特别是对于失意者来说，主动放弃求官的努力而选择做隐士，隐逸就具有了“社会安全阀”的调节功能。

因此，一个人能够成为社会认同的隐士，除了自身的隐逸行动，还与社会其他群体操持着某种标准“辨认”隐士的过程密切相关。而隐士自身的行动，以及社会打量隐士的标准，既是隐士个人表现出的价值内涵与人生态度，也是社会其他群体所认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准则。

本研究是以我国传统社会的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人物类型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理论开展一项社会思想史的考察；既是通过一种文化现象的考掘，为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行动取向提供借鉴和启示，同时也包含着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探索。这是一部体现了作者数年精力与心血的学术专著。

愿作者继续努力，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社会学中国化做出更多贡献，也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引发学界对体制外非主导性社会阶层、社会思想及社会价值观的研究与关注，共同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创新性贡献。

是为序。

王处辉

2011年9月于南开园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中国隐士的总体类型特征 / 20

第一节 隐士的身份形象溯源 / 20

第二节 隐士的不同称谓考略 / 25

第三节 隐士形象流变折射的社会思想 / 35

第四节 小结 / 49

第二章 中国隐士身份建构的德行基础 / 51

第一节 隐士身份建构的人伦情感：孝 / 51

第二节 隐士身份建构的人际关怀：义 / 56

第三节 隐士身份建构的人文修养：智 / 60

第四节 小结 / 64

第三章 中国隐士身份建构的个性行动 / 66

第一节 隐士身份建构的本质根据：不仕 / 66

第二节 隐士身份建构的个性行动：逃遁 / 71

第三节 隐士身份建构的经典借口：托病 / 75

第四节 隐士身份建构的操行砥砺：不入城市 / 79

中国隐士——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

第五节 隐士身份建构的自我体认：衣服 / 84

第六节 隐士身份建构的艺术手段：饮酒 / 89

第七节 小结 / 93

第四章 中国隐士身份建构的社会机制 / 96

第一节 隐士身份建构的认知基础：社会舆论 / 96

第二节 隐士身份建构的政治过程：征辟制度 / 101

第三节 隐士身份建构的话语甄别：历史书写 / 105

第四节 小结 / 111

第五章 中国隐士的人生准则 / 112

第一节 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 112

第二节 达则兼济，穷则独善 / 117

第三节 逍遥自由，远祸保身 / 122

第四节 小结 / 127

第六章 中国隐士的价值取向 / 129

第一节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 129

第二节 安贫乐道，淡泊名利 / 134

第三节 特立独行，卓尔不群 / 141

第四节 功成不居，退让明志 / 145

第五节 乐山乐水，悠闲适意 / 152

第六节 小结 / 159

第七章 隐士对士人群体的示范影响 / 161

第一节 士人以道自任的精神追求 / 161

第二节 士人入仕为官的现实追求 / 169

第三节 士人的隐逸情结与实践 / 174

第四节 小结 / 181

目 录

第八章 隐士与官员群体的互动关系 / 183

第一节 传统官僚系统的生态特征 / 183

第二节 官员群体的隐逸实践 / 192

第三节 隐士与官员之间的互动 / 206

第四节 小结 / 212

第九章 隐士与帝王的互动关系 / 213

第一节 帝王的社会角色 / 213

第二节 隐士与帝王之间的互动 / 216

第三节 小结 / 225

第十章 隐士及其隐逸行动的社会功能 / 227

第一节 隐士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 228

第二节 隐士的道德整合功能 / 238

第三节 小结 / 242

结 语 / 244

参考书目 / 255

后 记 / 266

绪 论

在传统中国，隐士是一类备受尊崇的特殊人物，从先秦至晚清民国，一直受到不同社会层面的密切关注。隐士的身影活跃在历代正史、地方志、文学作品等各种资料载体中，而且记录者多用高尚、高洁等溢美之词描述他们的行止、事迹。隐士不愿为官，被称为高尚；隐士傲视王侯，被视作高洁。因而，隐士在社会接受视野中，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富有道德意义的象征符号，承载着各个社会群体不同的价值期待。那么，隐士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类型，对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 身份的困惑：隐士是什么

历代史书的主要记录对象是帝王公卿、贵族将相等上层社会精英，而对一般社会精英只是予以适当关注。这种关注表现为，一般社会精英是以群体形象出现在历史记录中。这些人物的身份归类虽然也存在某些困惑，如一个人是酷吏还是循吏，观察立场不同，评判结果也会不同，因为“酷”或“循”是对个人职业品行见仁见智的声望评价；但“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职业，在这个基本的参照标准下，其身份归类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客观性。然而，隐士的身份归类标准却不那么精确，也不太容易获得社会的接纳和认同。

隐士是什么？这是隐士研究的首要问题和逻辑前提。按照一般的看法，所谓隐士，是以“隐”作为最典型的身份标识。那么，何为“隐”？《说文解字》曰：“隐，蔽也。”段玉裁注曰：“艸部曰：蔽茆，小儿也。

小则不可见，故隐之训曰蔽。”^①从字面意义来看，隐士应该是那些藏身山林而不为人知的人士，一些现代学者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解答“隐士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认为，“隐”是隐蔽的意思，士不见于世，所以称为隐士。^②但是，从史传记录来看，不少隐士并非藏行敛迹的遁世之人，反而是出入帝庭官府의知名人物。综观资料文献，历史上不仅隐士“隐”的行迹表现五花八门，而且关于“隐”的理论说明亦歧见纷呈。因而，“隐”存在多重理解，包含着太多的道德情感和价值评判等无法测量也无法衡准的因素，充满了不确定性。

既然从“隐”的直观字面意义上无法回答“隐士是什么”，于是一些学者又试图从“士”的特质来发掘隐士的真实内涵。隐士是“士”，所以隐士的精神内涵与身份特质都与“士”息息相关。有学者指出，由于“士”阶层的“士”是与为官作吏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有条件为官作吏而主观上却不愿为官作吏的一部分“士”，就成了隐士。隐士是指有条件为官作吏的“士”阶层中不愿为官作吏者，是同愿意为官作吏者相对立而存在的。因此，同一个士阶层就产生出为官作吏之士与隐居不仕之士的分野。隐居不仕之士同为官作吏之士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隐”与不隐，亦即为官与不为官。凡是为官作吏条件的士人而不愿为官作吏者，就是隐士。^③

从是否为官的角度而言，隐士就是指那些非官非吏的人士。因而，有学者概括指出，“隐”是相对于“仕”而言，隐士就是有资格入仕但却不肯入仕的人物，乃是根据其政治态度而得名。^④但是，不仕同样包含着多重理解。从早期的隐士形象来看，他们主要是因为不愿做帝王而逃遁，可以看做原型意义上的不仕。《庄子·让王》中塑造的隐士形象尤其突出。《史记》记录的隐士原型伯夷、叔齐，除了辞让王位而逃遁，还有谏阻武王伐纣不成，再次逃遁隐居的情节（见《伯夷叔齐列传》）。夷齐的再次“逃遁”，成为后世那些拒绝为官的隐士标识身份个性的逃遁行

①（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734页。

② 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第1页。

③ 高敏主编《隐士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序言。

④ 王仁祥：《先秦两汉的隐逸》，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5，第1~2页。

为。从拒绝为官来看，不仕就是完全彻底的“没有做官”。但是，史传中的众多隐士形象却常常是“弃官归隐”。也就是说，从整个人生履历来看，这类隐士的身份并不单纯，而是兼备两种对立的、矛盾的身份：官员与隐士。相当多的隐士是在官员与隐士两种身份之间摇摆，最终才狠心弃官归隐，如陶渊明。有的隐士干脆就是退休官员，与不仕的准则完全相反，如贺知章、宋代的“苕溪五友”。这些人为什么被视为隐士呢？

更有甚者，居官作宰同样可以被视为“隐”。宋人程俱《北山小集》卷33云：“吴郡有二老焉，或仕，或不仕，皆隐者也。”（《承奉郎致仕杨君墓铭》）不仕者被称为隐，仕者同样被称为隐。程俱仕者为隐的说法并非妄言，而是有着诸多的事实和观念依据。历史上许多隐士本身就是弃官归隐，更有甚者，有人在仕宦期间就自命隐士，如东方朔身居庙堂却表演朝隐（《史记·滑稽列传》），白居易作为州郡长官却自称中隐（《白居易集·中隐》）。如此以隐士标榜并不是特例和个案，而是几度蔚为弥漫官场的风气。由此可见，仕者为隐的社会认同程度是非常广泛的。种种例外，对研究者确立的不仕标准形成事实上的颠覆。而执著于这个标准，常常使研究者面对文献中复杂的隐士形象顾此失彼，只好把那些不能纳入不仕标准的隐士形象从古人的视野中剔除，结果当然是一个失真的研究结论。

在欧洲和印度，隐士主要指那些宗教隐修者，所以一些西方学者所言的中国隐士就是指僧人和道士。不过，僧人和道士是否为隐士，事实上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从史传记录来看，有不少道士被纳入隐士行列，但僧人却绝无仅有，绝大多数被摒除在隐士行列之外。如两部《唐书》中的道教徒隐士，他们是成功的、成名的道士，受到皇帝、高级政府官员的关注，经过“征召一辞让”这个建构隐士身份的社会定义机制，不仅生前被认定为隐士，而且身后还被纳入隐士传列。而佛教徒尽管常常是隐士的朋友，尽管他们的行止、道德修养与隐士没有本质不同，但自古及今，在主流思想中很少有人把他们视为隐士。魏晋之后，不少隐士精通佛典，如南朝宋的宗炳、周续之等隐士，与当时的著名高僧慧远往来频繁。隋唐以来，文人士大夫更是竞相礼信佛教，研读佛典，如王维、白居易、苏轼等

人。他们在仕途失意之时，一方面以隐逸安顿自己的心灵，另一方面也从佛、道的空无境界寻求解脱之道。特别是当佛教精义渗透到隐士退让的精神世界中，隐士苦行奉佛与僧人别无二致，二者之间的行动界限并不判然分明，所以宋人王谠的《唐语林》“栖逸”多载录僧人。但是，作为历代意识形态的各朝正史，并不将僧人视为隐士。武则天执政时期，监察御史王守慎固请为僧，得到武则天的嘉许（《旧唐书·隐逸传》）。在简短的传文中，史家的态度极为暧昧，似乎将王守慎纳入隐士传并非因其为僧，而在于其托病请辞这种行动。因而，王谠以僧人为隐只是孤音绝响，并不是主流意见。

同为宗教信徒，为什么道教徒可以被视为隐士，而佛教徒却难获这个殊荣呢？当然我们可以佛、道之间的差异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佛、道之间的不同之处，是他们能否与隐士“结亲”的关键因素吗？实际上难以遽下结论。王瑶认为，晋末庐山莲社就是一个包括僧儒道俗的隐士大集团。^① 这些隐士、道士和僧人虽然外在形象表现不同，但在学识、德行、自我修养、诗意地栖居等方面却没有本质不同，这也是隐士与僧人、道士交往的前提。那么，为什么道士可以是隐士，而僧人却不能？实际上，并不是隐士与道士亲缘近而与僧人关系远，也不是佛、道之差异造就这一不同待遇，而是社会定义机制的预设结果。也就是说，在隐士的身份边界向宗教徒扩张的时候，人们认定道士的首属身份可以变更而僧人不可变更。或许这也是事实，也是人们考虑的关键因素。所以道士能够身兼隐士，而僧人却不可。我们以为，这种不可只是社会认同和话语机制的制约，并不是确有真正事实上的区分根据。

藏与不藏、仕与不仕、宗教与世俗，矛盾对立的行动和人生都可以被纳入隐士的范畴，因而，“隐士是什么”似乎并不存在一个确切的答案。这种研究对象难以做出准确界定的情况，在秦晖的农民研究^②、韩起澜

① 王瑶：《论希企隐逸之风》，见《王瑶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223页。

②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1页。

(Emily Honig) 的苏北人研究^①中同样出现过。与秦晖致力于辨析各种农民定义而提出自己的概念界定不同,韩起澜没有纠缠苏北人究竟是什么,而是转换视角,探讨苏北人这一类别借以建构的过程。韩起澜发现,苏北人是苏北人自身与上海人共同建构起来的族群身份。那么,融合矛盾对立的行动和人生的中国隐士,是否也是一种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建构的身份?本书将在考察隐士身份建构机制的基础上,揭示隐士承载的价值观念,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关注隐士折射的社会思想,也就是通过一种人物类型的研究,揭示一种有持久影响力的思想观念。

二 关于隐士的学术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学术界曾出现一个隐士、隐逸研究的小热潮,连续出版了十多种专著,并有多篇相关文章发表。从现有成果来看,有关隐士、隐逸的研究基本集中在文学与史学领域。研究者或者搜罗正史、方志等资料文献记录的隐士,侧重对隐士及其价值观念、生活状况等方面作知识性介绍;或者从造成隐逸的政治制度入手,探讨隐士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或者将自己代入隐士的内心世界,探测隐士的人格与心态。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隐士、隐逸研究渐趋平淡。以下仅就隐士、隐逸的研究专著作一个学术发展脉络的简单回顾。

抗日战争期间,蒋星煜编著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是目前可见最早的现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隐士研究著作。在这本大约七八万字的小册子中,作者从十个方面介绍了中国隐士的基本状况。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隐士在历史中的不同称谓、这些称谓的含义以及各种称谓之间的联系;第二部分从个人主义和失败主义两方面,以及中国古代的逃避哲学,归纳了隐士形成的因素;第三部分从隐士的政治、经济、社会、精神生活,把隐士区分为八种类型;第四、第五、第六这三个部分,是关于隐士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描述;第七部分是隐士的地域分布,作者用表格把正史、方志等资料文献中可能收罗到的隐士,按照隐士隐居的地域,进行了

^① 韩起澜著《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前言第2页。

细致的数字统计，并对每个隐士作了简单的信息概括；第八、第九部分描述了隐士与中国古代诗歌、绘画这两类高雅艺术的关系；第十部分谈中国学者怎样批评隐士，表明作者自己对待隐士的态度，并向世人呼吁，“勇敢的生活，不作隐士”。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是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成果，此后大陆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深入研究，直到1988年上海三联书店再版该书后，才陆续有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问世。不过，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蒋星煜曾经探讨的那些方面做文章，最多也就是资料范围扩大，梳理更细致。因此，这本内容比较简略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是研究中国隐士的奠基之作，可以说开创了中国隐士研究的基本范式。我们现在看到的研究隐士的中文著作，都没有跨越蒋星煜确立的模式。如聂雄前的《中国隐士》、韩兆琦的《中国古代的隐士》、孙适民等的《中国隐逸文化》等，基本上重复了《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套路，对资料文献中的隐士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细致梳理，是知识介绍性的文化读本。

当然，与蒋星煜对隐士的否定态度不同，当代学者在情感立场上发生了逆转。如张立伟的《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马华等的《隐士的真谛》、冷成金的《隐士与解脱》、陈洪的《隐逸人格》、王德保的《仕与隐》、许建平的《山情逸魂——中国隐士心态史》、木斋等人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等。论者虽然试图揭示隐士、隐逸现象的文化实质，但基本上仍旧是资料的归类梳理，侧重知识性的陈述介绍。另外，论者沉湎在既定的情感氛围中，或者赞美隐士的独立人格和反抗精神，批判王权的独裁专制与腐朽没落，或者颂扬真隐士的高尚道德与审美人生，谴责假隐士的沽名钓誉和钻营投机，而没有以旁观者、局外人的中立立场来审视打量隐士。这种情感倾向和立场，使研究者不得不作出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或美与丑的评判。是非真假的评判固然不可或缺，也是隐逸现象中客观存在的，然而强烈的现代思想意识和价值立场、非此即彼的两极评判方式，不仅不能合理描述过去存在的社会现象，而且不能有效地探究中国古代以隐士、隐逸为中心的社会思想观念。

徐清泉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论要——从隐逸文化、文艺实践及封建政治的互动分析入手》一书，从文艺美学的角度探讨了传统人文精神，其

中包括中国文人的隐逸情怀。该书对隐士、隐逸现象的探讨，也基本上延续了蒋星煜的思路。该研究的独特之处，是作者尝试运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古典问题。该著尽管在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方面具有探索性意义，但作者应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方式值得探讨。作者的写作方式是，先介绍有关隐士、隐逸的内容，然后抄录相应的西学理论，接着再进行二者之间的关联解说，有冗杂、堆砌之感。

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隐士和隐逸现象受到一些台湾青年学者的关注。其中王仁祥的《先秦两汉的隐逸》是从政治史、思想史的角度考察隐士、隐逸现象，主要探讨了政治环境与隐士的类型，隐士与政治上层的互动，隐逸思想如何产生、演变，士人如何决定其出处进退等问题。该研究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蒋星煜的范式，但与大陆学者的研究显著不同。作者以一种平实的态度，甚至是价值中立的态度看待隐士、隐逸现象，特别是著者对隐逸思想的源流分析，对本研究颇有启发。例如，一般认为《易经》的乾、蛊和遁卦是隐逸思想的根源，但作者的观点是，这些卦辞和爻辞的隐逸思想其实只是后人比附性理解的结果。虽然作者是从文献梳理的角度进行思想源流考辨，但却是一种思想史的考古发掘，即考问那些卦辞和爻辞为什么会成为隐逸思想的表述，如何可能成为隐逸思想。王仁祥的研究思路可能来自日本学者。日本学者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直持续进行中国古代隐士和隐逸的研究。他们对中国隐逸的研究内容较为丰富，研究角度也比较广阔。不过，根据王仁祥的综述来看，尽管日本人的研究视角不同，但也在纠缠谁是隐士、隐士与政治等问题。而王仁祥也没有脱离日本学者的研究取径，他认为日本学者对散见于“逸民传”之外其他列传的隐士挖掘不够，显然同样专注于辨识隐士、追认隐士的工作。

李剑锋的《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是另一部颇有参考价值的论著。该著是对历史上一文学现象的研究。作者以现代西方解释学和接受美学为主要理论指导，兼用传统朴学方法梳理资料，深入论证了陶渊明及其诗文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被历代文人学者不断接受和塑造的过程。作者认为，陶渊明接受史是后代读者对陶渊明及其诗文、后代读者对前代读者的接受成